

海外博士 面临归国生存考验

对于时下的海外学子而言,“归不归”其实不是问题所在,真正的问题是“怎么归”。

在北美、欧洲以及亚洲等中国留学生聚集的“圈子”里,一些博士毕业面临择业压力的年轻人,正在为去留的问题激烈斗争。一股彷徨、焦虑的情绪在蔓延。

“归吧,(国内)消费与国际接轨了,收入归到了第四世界,怎么归?回国图个啥?”也有人追问:“那每天吃饭图啥啊,活着图啥啊?”“圈子”内的争论再次打破既有单纯、平静的求学生活。

在距离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——留美幼童开启留学生涯140年的今天,一些博士海归开始为能否回国、以何种身份回国而纠结。

想做事的人 还是想回来

即使是现在,郭伟(化名)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回国,虽然他在前两年前就在考虑不再续签工作合同。受他法国导师的看重和挽留,他一直待在国外做博士后,负责一些项目及研究工作。其间有一天,他远在上海的夫人在电话中跟他讨论“幸福感”的问题,他才意识到回国发展的紧迫性——对家庭而言,经济上的考虑固然重要,但一家人在一起才是首要的目标。

现在,郭伟开始留意国内外好的就业机会,并频频与国内几家单位接洽,游走于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一线城市。

与那些在国外拿到学位的“纯海归”不同,郭伟的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在国内获得,随后他赴法国做博士后,因此算是“半海归”。

坐在宿舍电脑前和记者视频聊天,郭伟强调:“人太多了,得先回国占一个位置。占个位置很重要!”

其实,国内用人单位对于“一般”海归挑挑拣拣的做法已非新闻。由于近年受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,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,海外人才不断涌入,以前那种海外学历吃香的时代正在远去。这或许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特征。

博士学位还不够

一边是高校、科研机构,一边是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城市,在回国路径的抉择上,高校与城市是两个重要的衡量因素。

多数情况下,博士毕业的海归会首选高校,如“211工程”名校,以国内排名TOP10为主。如果遇到非大城市如北京、上海不去的情况,甚至退而求其次,进入一般大学的也有人在。

留学生倾向于国内名校的职位,国内高校同样看重海归的名校身份。近年来,名校之争、大城市之争在海归的回国选择中愈演愈烈,这让很多国内名校对应聘者的要求越来越高,职位也越来越少,让一般人不敢染指。

以北京、上海等地高校为例,一些高校所聘岗位不仅要求求职者是留学海外的博士、博士后,还必须来自海外如北美名校。中国前20名的高校对于北美高校的博士生,尤其是拿到终身教职的人才,基本上会照单全收。

“这导致了一个问题:国内高校对留学生‘海外名校毕业’的身份要求近乎苛刻,甚至已超出职位本身的能力要

一周前,苏瑾(化名)和她在韩国浦项工业大学的同学登记结婚,至今仍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幸福之中。

苏瑾的硕士、博士都在浦项工业大学就读,专业方向是化工,预计明年博士毕业。在博士毕业之前搞定了自己的婚姻问题,对于不少抱憾于与婚姻无缘或者被岁月蹉跎了的博士来说,无疑是一件幸福而又明智的事情。

苏瑾向记者描述自己的时候,称自己小眼睛、矮个子……热心、活泼,认死理。当记者征询因为隐私是否有必要隐去学校名字时,她在QQ窗口打了一行字:不用,算是为浦项工大免费宣传一次。

苏瑾家在中部城市,她老公家在东北,两人都是独生子女,因此对于双方父母的照顾成为他们回国发展的决定因素。“回国是肯定的,不过可能不会毕业后马上回国。”苏瑾说,“假如以后我们在国外发展的话,父母肯定是我们心病。”

选择回国是一种家国情结

把握回国时机,对海归们来说尤为看重。特别是对于理工科博士而言,仅有国外博士学位还不够,还必须有一定的研究成果。否则即使回到国内高校,也因为拿不出手的研究成果和高影响因子的论文,短期内难以开创局面。

心仪高校,和苏瑾的性格有关。在学校和实验室呆久了,让她始终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,找到外界无法理解的满足感。由此,高校成为他们夫妻回国发展的首选。

选择回国,还出于异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。“留在国外,最主要的是文化需求上比较难满足。本来在外面很多中国的东西都接触不到,然后待的时间太长,总觉得没根没底的,心里很不安稳。”

在集体主义比较严重的韩国,实验室的同学一般都是

求。”郭伟说。

去年,郭伟到上海某高校应聘,对方出于对他“非名校出身”的判断,继而对他的科研能力、专业方向也不在意起来。对方甚至明确表态:你来了后能拉来项目、拉来钱吗?

“国内高校不是想培养大师,而是想引进大师,通过引进来带动一个方向或领域。”这种直白的表述引发了郭伟的沮丧和愤怒,“它们(国内高校)缺乏容忍、隐忍、厚积薄发的精神,急功近利,很想成功,又没有耐心。”

通过和在海外工作多年的老外、海归们交流,郭伟发现大家在某一点上有着高度的认同:想回国发展,想要获得更好的机会,博士学位已远远不够。必须在海外高校拿到教职,那时候回国才会受到“真正的”欢迎。

过渡阶段先占个位置

相比较国内博士生每月几百元的补贴,国外的补贴、奖学金则相对丰厚许多。在韩国,博士奖学金为150万元韩币,相当于9000多元人民币。其中除去70万元的学费,以及每个月三四十万元的伙食费,还能省下一部分。其博士后月薪约为240万元韩币。

在欧洲,博士后的月薪约为2400欧元,维持基本生活

海归语录

现在国内虽然有很多人才引进计划,会提供项目资助、经费支持,但要求很高,如是否是紧缺专业,是否有雄厚的背景(拿到国外教职)以及其他头衔。这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高新技术人才的侧重点有点偏,对牛人太重视,对一般性有发展潜质的科研人才重视不够,造成他们的生存环境很艰难。

真要回去,心态肯定要调整,不管怎么样,自己要问心无愧吧。对于国家民族,我拆开来说,为了“家”为了父母回国的决心是肯定有的;“民族”,就像文化落差的问题,是很啊;“国”,其实,我们这些在外面的“穷二代”,可能很多人真的还是想着国家,总想回国的。虽说现在国内很多情形让我们挺失望的,比如毒奶粉、撞动车什么的,可是,只能说想报不容易,爱难说出口吧。

我想起曾经读过的《巨流河》里面的一段话,是国学大师钱穆说的。他说:“‘文革’结束后,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,他们有说话的一天,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。”然后我在人人网和国内很多同学讨论这段话,我们都在思考,我们这一代人,预示的就是中国的将来,我们又会把中国引向哪里? (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张林采写)

回国后担心被浮躁

一起做事,这让中国学生很不习惯。“韩国学生聊得开心,虽然也会照顾你,给你找话题,但是总是觉得很孤独。”苏瑾说。这种天然的疏离、排斥,让外人很难融入。

苏瑾的同学评价她是一个才女,文史方面的书看得较多,容易感性。她的选择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:回国,是很多海归们都有的“家国情结”带来的必然选择。

看重在二线城市发展

浦项工大的软硬件条件在亚洲高校中属于佼佼者,硬件条件尤为突出。之前有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来此作交流,对学校环境很是称赞。

苏瑾研究的是新能源方面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,对于他们组来说属于新开发的方向,近几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,在产业化和合作方面也多有突破。

“我们课题组在韩国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组,但是理论支持还不是太多。国内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宁波材料所都做得很好。”苏瑾说。同时,专业上的优势未必会成为回国就业和发展的优势。“还是要看平台。要是所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正好有发展这个方向的考量,又有资金和项目支持,可能就比较契合。”

出于对回国后生活压力的考虑,苏瑾将来倾向于选择二线城市发展,并且不排除回双方一方的老家。对于如今很多海归首选一线城市,造成一线城市人才济济、竞争激烈,苏瑾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理性和对从容生活的追求。

在尝试和国内学校一些老师接触,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,苏瑾感到博士毕业立即回国好像不大有优势。

“比较好的高校,如‘985工程’之类的,博士回去后只能是讲师,一开始没有学生,没有课题,只能跟着大组的大老板后面打杂。每个月基本工资,挣扎在温饱线上吧。”差一些

且尚有结余不成问题。

在北美,取决于不同州,博士的全奖略有不同,但平均也在2万美元左右。

依靠微薄的补贴或奖学金,尤其读到博士的同学往往也到了成家的年龄,很多已经娶妻生子,国内的博士将面临生存困境,他们很难不向家里要钱,而且这种境遇还和导师的水平有很大关系。在生活的重压下,又期望他们做出优秀的工作,压力可想而知。

博士生在待遇上的国别差异,恰恰反映出他们在就业后所获得的薪酬水平。“海外的博士挣钱确实比国内多,如果我们回到国内一线城市从讲师做起,每个月几千元的基本工资很难撑起一个家庭。”郭伟说,所以他会相应降低标准,先在国内占一个位置过渡一下,然后再考虑进一步发展。例如,去二三线城市发展。

郭伟的选择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,但他认为这也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。对于不少倾向于回国的海外学子来说,国内的位置越来越少,待遇也不高,让他们难以抉择,陷入想回又不能回的两难境地。

“想做事的人还是想回来,在国内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比海外多得多。”郭伟直言不讳地说,“其实最理想的一条回国路,就是在海外混得小有名气。只要你是牛人,国内肯定欢迎,待遇也很好。”

的学校可想而知。

因此,苏瑾也许会和老公先做一站博士后,一边做博士后一边继续留心国内的位置。回国是肯定的,对苏瑾来说,毕业后立即回去并不明智。

为浮躁之风担忧

前一阵子,南方科技大学因为核心团队出走而引发的案例特别火,引起苏瑾和香港及内地一带同学的激烈讨论。

“我很奇怪,为什么在国内办一个民办研究型高校这么难。感觉到底还是因为制度问题,才会做点什么事情都显得惊世骇俗,口水多过行动。”苏瑾说。

与之形成反差的是,类似于香港科技大学和浦项工大的研究型学校,这几年在韩国已有多所异军突起。“很顺利,建成没几年都能发SCIENCE、NATURE了。管理清明,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条件也都不错。”

据介绍,在用人招人上,韩国的私立大学经常招收刚从美国毕业的博士或者博士后,来之前工资和实验条件都谈好,新教授回国一般不到一年都能建成自己的实验室,买好仪器招好学生开工,上手特别快。

“感觉挺简单的事儿在国内都变复杂了。我觉得还是浮躁虚荣。驴粪蛋表面光!”

苏瑾说,“一个国家的浮躁,挺危险的。”

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,苏瑾也在两手准备:一边留意国内的职位,一边试着申请国外的博士后。如果不顺利的话,她只能选择别的方式“曲线回国”了。

回国 以什么身份?

张圆圆(化名)是典型的北京女孩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,在国内辗转了几年,为了更好的发展留学德国。一切行动都很毅然决然,不拖泥带水。

在德国完成硕士学位后,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最近,她回国了。她对她的一个朋友说:“我想结婚,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。”

也许是对于德国“严谨、刻板”的教育制度带来的超长学习周期(虽然这一教育制度已经改变)的厌倦和疲惫,她甚至可能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。这也和她所选的文科专业以及未来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不无关系。

另一个原因是,虽然德国的教育收费不高,对于以德语为主修语言的留学生来说甚至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压力,但对主修英语的留学生来说则价格不菲。

国外的人想回来,但是以什么身份回来,很多人纠结这个问题,很多人于是选择暂缓回国。

张圆圆看似是个特例,其实再正常不过了。

一个萝卜一个坑

10年前,海归们进入国内高校相对容易,那时候出国的人不多,回来的人更少,机会似乎俯拾皆是。海外学历是一个富有含金量的耀眼光环。

现在的情形大为改观。海归,回来后活不活不下去都成问题。不久前的一个例子,一个林业专业的德国硕士生毕业后曾考虑回北京,意向方单位开出税前月薪3000元的工资,把他“一闷棍打了回去”。

当时美国的房价也就每平方米6000元人民币,一般的美国人工作三四年就能买一栋上百平方米的独居。反观国内的生活成本,北京的房价,那个德国硕士没理由回来。

“以前国内缺人,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,压根没位置。”张圆圆无奈地说,“我们在国外讨论很多,非常苦恼,但国内的工资实在太低,只要不是十分之十的人才,就别考虑(回来)。”

和大多数海归一样,张圆圆考虑最多的还是父母亲人都在北京,需要照顾。找工作也需要关系。“博士毕业后都30多岁了,年龄没有优势,怎么办?”

在德国留学,与文科生相比,理科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,一个班能顺利毕业的也就两三成。当然,一旦修成正果,前途相当明朗。德国的薪酬透明、公正,博士毕业一旦有企业同意接收,必须按照规定的学历标准支付工资,低于标准的薪酬可视为违法行为。

张圆圆介绍,外国人得到一份工作前,必须先去当地的工作局(相当于国内的劳动人事局)办理工作签证,工作局会考察用工方支付的薪酬,如硕士、博士应有相应的薪酬标准。低于标准的外国人将无法获得工作签证。“必须遵循规范,同时也是出于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的需要。德国人就那么一丝不苟,严格按照章程办事。国民性使然。”

博士多 不如技术工人多

在德国,小孩很早就开始进行分流,约25%的人选择升高级中学、上大学,剩下75%的孩子上技校当学徒或者学习其他技能。对于德国家庭,大学只是一个途径,相反技工挣钱也不少,学手艺更受德国家庭的欢迎。

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子中,有一些在当地找到工作,也有做买卖的,要不找个老外结婚,还有最后不得不回来的。当然,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,出于对孩子未来发展的考虑,不回来的可能性更大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德国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。这主要取决于孩子父母的收入,德国政府对于低收入家庭有相对公平和完善的保障。

“德国也在吸引人才,计算机、生物、机械等专业比较缺,但毕业很难。只要毕业了,就会和工资水平挂钩。”张圆圆说。

在当地,外国人融入本地社会尤其难。“中国人和中国人玩。”张圆圆调侃道,“我出去之前谁愿意在央企待啊,现在不一样了,许多当时的同学都成了这个‘长’、那个‘长’的,回来请吃饭都是他们请。在国外的人一般都很节俭。”她的话透着一股失落感。

在德国待的这几年,让张圆圆对这个以技术工人闻名的国家抱有很大的敬畏感。就像德国家庭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技术工人,而不是大学教授。因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:社会哪里需要那么多大学教授。

而中国,是不是应该大力培养技术工人,而不是博士?

“出国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,会很痛苦。回家就是写作业,考试是实打实的,剩余的时间还得打工挣钱。”张圆圆认为,国内在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或许存在误导。

改变它 融入它 做科研交流使者

韦东胜,德国汉堡大学的生物博士,即将毕业。从当年获得德国政府奖学金,到现在代表德国到荷兰皇家科学院作3个月的短期访问,他用了近5年时间,也赢得了许多值得骄傲的成绩。

“他是那种比较钻事业的人,也是一个书呆子。”他的朋友在评价他时也不忘捎带挖苦一句。但见过他照片或本人的人显然不会这么认为,说他敬业,事实俱在;说他迂阔,对于一个目光带着执着的人来说,怎么都靠不上。

韦东胜在荷兰访问期间,国内主要的科研院所、高校正在德国部分城市招聘人才。据说,中科院、同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悉数到场。

他把这条信息当做花絮告诉记者,同时引出了他的另一个话题:今年,他得到欧洲微生物学会(FEMS)颁发的奖学金。这是一项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资助。

韦东胜的研究领域是微生物学,目前在荷兰的主攻方向是青霉和曲霉的系统分类。青霉和曲霉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生物,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,在医药和食品等行业有很大的应用价值,因此他的研究方向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。

韦东胜认为,只要在国外脚踏实地工作,肯定会积累很多经验,回国后就能保证自身的优势,而不用担心有没有职位的问题。他经常回国,和国内单位保持联系。“其实国内外的实验条件并不比国外差。国内缺的是学科带头人。”他说。

韦东胜刚到德国的时候,遇到一件让他不解的事情。一个中国博士毕业后在当地中国餐馆当服务员。即使后来知道餐馆服务员的月薪可以达到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,接近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。

今天,当面临博士毕业的时候,他开始理解了。许多留学生不回国,固然有种种考虑,但即使在德国当地找一份不算太好的工作,生活依然能够得到保障,而且很可能还比国内强。

“大部分人愿意留在国外,我理解,但这不是我的追求。”这是韦东胜一贯坚持的态度。他的目标是回到国内做一名学术带头人,并能够经常和国外科学家一起做课题、进行交流。

“我愿做一个交流的使者,能够带动两国在科研上的进一步交流。”正如当年他在申请德国政府奖学金时所坚持的那样,他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梦想的人,否则当初也不会选择出国。

“坐公交车的时候,看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,才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。这时候非常想家。”韦东胜说,博士毕业不回国是很可以理解的。不过祖国总是自己的。要改变它,最好的途径是参与。